

論臺北城的殖民現代性—— 以市區改正與新興建築為觀察核心*

江寶釵**

〔摘要〕

本文論述日本治臺期間在臺北城的改造，因之所銘刻的殖民現代性。焦點集中在兩部份，一是市區改正，一是新興建築。殖民政府在臺北城有那些興築？城市的本身如何變成功能充分的教育形式？臺灣人又如何肆應這種被教化？呈現怎樣的接受、怎樣抗拒？人們如何因此改變他們的生活？它的陷溺與自覺，如何鐫刻於臺北地理空間以及其他相關的書寫？

關鍵詞：日治、殖民現代性、城市、臺北、市區改正、新興建築

* 本文曾根據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進行修改，在此表達由衷的感謝。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許多「案內」或官方文書，指謂臺北市就以「臺北市」出現，但許多民間漢文報紙如《風月報》、《三六九小報》顯示，文學書寫者的想像，卻是在「日本內地——臺灣南方」的相對位置下，直接拿它來與日本東京的「帝都」——並舉。是故在臺北市的定稱之外，「島都」之名也一再出現。

島都的命名，呈現臺北作為臺灣島中心的命意。而事實上，臺北這個城市，無論是外來人口的移入，人口的異質性，或殖民政府「市區改正」計畫的實施，建築勃興，住民與住所共同為臺北織造不同的面相與特色，確實都在臺灣島獨領風騷，不負「島都」的命名。而承載此一島都之名而與其他城市差異的載體，就是城市本身的建置，舉凡街道、牆垣、房舍、公共設施，落實為總督府、學校、教堂、神社、廟宇，郵局、銀行、咖啡館、博物館、百貨公司等人文建築，這些得益於全島行政中心的概念，以及資本主義發達而出現的建置，既是國家統治、主流價值及道德秩序之所繫，但在嚴正的倫理道德或敬謹的社會秩序之中，也存在著縫隙，縫隙中，時時隱現著的或奢靡消費，或縱欲享樂，或頹廢歡愉的生活景觀；或者就這麼說，政治、科技與社團，時尚、情色與感官，同榮共長。其次是公園裡草花樹種的自然種植，如陽明山及臺灣大學校園內仍有平戶種杜鵑的芳影，而做為熱帶島嶼，陽明山卻遍植櫻花。凡此種種，都成為島都名下所繫屬的範疇。

種種城市想像與城市文學，牽曳著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經濟之間的互動。城市文學，既存在著文化興微裡的名士風流，經濟良窳下的庶民勞動，更有政治主權的改易，不斷湧入的移民，科技文明進展中的工作方式、價值觀的變遷，不斷地髹漆其多義性。也因此，吸引了傳統文人與新文學作家跨入「城市」寫作的行列，城市不再限於只作為單一的文學場景，透露更多因「城市」崛起而改變之中的感性結構。至於研究者的視域擴及都市書寫，則起步較晚。約略可知者，如施淑的兩篇論文〈感覺世界——三〇年代臺灣另類小說〉、〈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以及陳建忠〈差異的文學現代性經驗〉觀察「都市現代性經驗」。這種現象近期有大幅的進展，學位論文的出現尤為指標，如陳允元〈島都與帝都：二、三〇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象（1922-1937）〉、¹黃千珊〈日治時期

¹ 陳氏注意城市存在著二個世界：「光」與「闇」，「光之城市」光鮮亮麗、文明開化的

旅人的城市經驗——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核心》²等次第增加，此地無法逐一一列舉。這些先行論述擴大了城市研究的面相，成為本文參考的基礎。然而，我們仍然要承認，城市的議題含括的範圍極為廣濶，因此不得不有所範限。如何範限？歷史載明在清領庭議中欲墟其地的臺灣，最初處於邊緣，最後在清末時期的外國壓力下變得重要，由劉銘傳、沈葆楨等幾位能臣的手上完成初步的都城建構；進入日治時期，經歷內地延長主義到皇民化過程，殖民政府透過現代化的統治，用力於創造與使用不同的「空間」概念，在具體實踐為都市計畫的系列動作：市區改正，改造舊街道，構建新建築，設計新地景等等，經由新興的空間意象，步步為營，逐漸地演化出臺灣生活機能與過去的差異，進而由視覺與「身在其中」的浸染，內化為意識形態的控制，對於本文而言，「都市的本身是一種非文字書寫的正文（text），它以各種存在物與事件作為符徵（signifier）」，「指向這一個時代變異中的權力結構和生產方式，同時也延展出人類的知覺型態和心靈結構」。³以故，本文的議題將集中於城市的改造，分兩部份論述，一是市區改正，一是新興建築。殖民政府在臺北城有那些興築？如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城市的本身如何變成功能充分的教育形式？臺灣人又如何肆應這種被教化？呈現怎樣的接受、怎樣抗拒？它的陷溺與自覺，如何鐫刻於臺北地理空間以及其他相關的書寫？

本文使用的文獻材料，將係當時各種文獻形式留下的記錄，⁴包括文學作品與

一面吸引無數的人前去朝聖，在消費文化的作用之下，只要付得起代價任何人都能體驗一番貴族式的待遇，與之相對，「閭之城市」的存在卻也證實無產階級的人士想要在城市謀生是可望而不可及，許多失業的人滿懷希望到城市尋求工作機會卻四處碰壁，只能像流浪漢似的到處流浪。陳允元：〈島都與帝都：二、三〇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象（1922-193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² 黃氏提及日治時期許多人注意到現代都市在繁華炫麗的外表下，尚有許多缺失之處仍待改善，而他們的都市書寫也揭露城市陰暗的一面。黃千珊：〈日治時期旅人的城市經驗——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核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³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著，夏鑄九譯：〈都市風格的理論架構〉，《自由青年》第82期（1990年9月），頁12-17。林耀德曾加以引用，《甜蜜買賣——臺灣都市小說選·序》（臺北：業強，1989年），頁3-4。

⁴ 關於歷史臺北，已有月刊形態的《臺北畫刊》（臺北：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1968年），每兩期介紹一個臺北行政區的今昔對比，凸顯其演變史。都市計畫資料則有《臺北市都

歷史敘事，以及鑄印於明信片中各式各樣的照片。就文學臺北而言，長久做為島的核心行政區與樞紐經濟，它的範型，是一座城市。有關這座城市文字符號的書寫，是即城市文學。城市文學的第一個層面，即城市此一空間與書寫者的關係。就形式而言，城市是某一個行政區，有一定的空間結構塑造的外觀，書寫者筆下的城市，不可能按圖索驥似地素描、報導，而即便素描也融入他個人的印象、視角和思維，乃致詮釋，由於「空間結構」是共用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援(Structure of space is the material support of time sharing social practices)，⁵因而書寫者的作品，往往也就呈現一定社會變遷的意義。基於這樣的理解，筆者期能一方面作深入的文本討論，另一面則期能開啓歷史的、社會的向度，討論臺北城的政治、經濟以及都會形態的人文景觀，本文與社會，文字與視像交織的閱讀。

二、殖民入城，臺北摩登？——「市區改正」的殖民性與現代性

就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而言，城市是現代／西方所特有的現象與發展，集資本主義、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理念於一域，提供民主制度之實踐。⁶韋伯以中國城市未在官僚控制之外，發展出獨立的自足領域，再加上特殊的社會／宗教背景，使得中國無法產生像西方那樣的「城市社群」(urban community)，認

市計畫事典》(臺北：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996年)，係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委託中華民國都市發展協會製作的報告，其中附日治初期臺北城詳圖(出自1904版臺北堡圖)。而今昔對比，則有大地出版社出版的《臺北老地圖散步》(漢寶德等撰文，鄧南光等攝影，臺北：大地地理，2000年)，詳盡地介紹地名由來與發展照片、圖錄，特別是今日地圖與日治、清代地圖對比。李清志撰寫的《都市偵探學》(臺北：創興，1997年)、《臺北方舟計畫》(臺北：紅色文化，2000年)以及臺北市政府新聞處出版的《瞻前顧後——臺北的絕版、復刻與新生》(許允斌著，臺北：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6年)都提供了追索臺北記憶相當良好的參考資料。一直都有許多文史工作者，藉由口述歷史、考古挖掘、行走踏查的方式，去建構、記錄不斷變動中的人文景觀。本文擬接收既有的成果，同時也尋找老照片、剪輯新聞報導，爬梳地方史志。

⁵ 張鴻雁：〈城市空間的社會與「城市文化資本」論——城市公共空間市民屬性研究〉，《城市問題》第5期(2005年)，頁6。

⁶ 轉引自熊月之、張生：〈中國城市史研究綜述(1986-2006)〉，《史林》第1期(2008年)，http://www.sino-eh.com/sts/ThesesHTML/Thesis_557.shtml，2012年6月12日查詢。

為中國沒有城市。⁷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孝悌所領導的「明清城市」計畫，⁸正是要駁斥韋伯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是有城市，相對地比較自由（特別是明代），也曾經發生過商業革命。商業革命可以「從商業擴展與商品化的現象」，國內市場的形成，「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尤其是雇傭勞動關係的出現」；⁹此外，消費市場逐漸擴大的趨勢，促進了生產，甚至也促進了工藝技術的改良，¹⁰同時，工商業團體組織也相繼出現。¹¹

以這個觀點來看臺灣，基本上是適用的。光緒元年（1875），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建臺北府於大加臘堡獲准。歷經幾位巡撫如丁日昌、沈葆楨、劉銘傳¹²等的經營，其樣態正好符合李孝悌用來駁韋伯說法的兩個徵象，是自由的，也曾經發生過產業革命，造成西方產業革命的火車、電報這些現代性的象徵物，都已在臺北出現。

然而，早期「現代性」象徵物的出現，卻不能使臺北市完全擺脫傳統社會的封閉性。在城市的街道結構上，正如蘇碩斌所指出的，清末的臺北仍是三個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大約為今日的大同區、中正區及萬華區）聯立的地方社會，是三個各具歷史、互相區隔，卻又毗鄰往來的地域單位。¹³一八五〇年左右，

⁷ 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1985), pp.1-14。

⁸ 李孝悌總主持，「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國科會計畫代碼 AS-95-TP-C03，執行期間 2006.01.01-2008.12.31。citylife.sinica.edu.tw/intro/intro_00.htm，2012 年 6 月 12 日查詢。

⁹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17 卷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219。

¹⁰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頁 225。

¹¹ 邱澎生：〈試論清代臺灣工商社團權力發展的特質〉指出臺灣的工商團體如「郊」或「行郊」，都係清代臺灣一種進出口貿易商團體，以港口市鎮為據點，做進出口生意，並逐漸發展為市場圈。這部份另參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2008 年）中的序。

<http://www.sinica.edu.tw/~pengshan/Taiwanmerchantassociation.htm>，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¹² 許多人以為臺北城的現代化始於劉銘傳，不過，許雪姬卻不盡同意。參許雪姬：《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臺北：自立晚報，1993 年）。

¹³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與權力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2005 年），頁 21。

整個臺北市的經濟發展大致集中於西區靠近淡水河部份，如大稻埕、艋舺等地。

臺北城的現代性與傳統性，基本上呈現一種混雜的狀態，而且是後者大於前者的狀態。在進入殖民政府治理後，有了根本的改變。

根據日方的記載，日軍進城係臺灣士紳自請引入的結果（明治 28 年〔1895 年〕6 月 7 日）。在馬關條約簽訂，同時「臺北府所在地之清國文武官悉已逃亡，已無一兵，而土匪乘之蜂起，肆逞掠奪之情，切請日軍前往鎮壓。」¹⁴在在都顯示，當時日軍入城係政治上已割據、社會上已接受的必然結果，這個事實清楚地呈現於石川寅治的「北白川宮入城圖」¹⁵裡。該畫圖所在為臺北城，一隊坐馬雄糾糾的日軍已經由「承恩門」（今北門）通過城牆，正在街道中行走，觀看者為朝廷遺棄的中國遺／棄民，他們著長袍、紮辮子，仰視著馬上的官軍。這仰視係「被收服」的象徵，而更具體的意義是，中國符號用來表徵防禦外患的「城」已瓦解，它已無力於被授予的防禦功能，這是一個符旨被空洞化遺下的符徵，傳統性所能據守的空間已撤去——落實來說，則城牆在日治時期陸續拆除。對居民來說，原有的範疇劃定的已經消失，劃定範疇的權力已經轉移，他們將要邁入更大的未知之中，這便是日本在臺灣所實施的一切現代化的開端。¹⁶

本節將以市區暨其相關措施，如土地、戶政調查、地下水道設施作為第一部份的思考重點；第二部分，則將討論市區改正計畫的社會意義。

（一）市區改正計畫與相關措施

這個現代化的開端，建構於地景的改變，而土地，正是地景的載體，也是國家主權與財富之所在，其管理尤為現代化國家所不可或缺之行動。因而，劉銘傳

¹⁴ 「基隆失事二日，臺灣士紳（如進士、舉人、秀才）一人前來基隆，求謁臺灣總督，曰：『名辜顯榮，來自北云。』」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中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

¹⁵ 該圖係臺灣總督府獻給日本明治神宮外苑聖德紀念繪畫館的壁畫。（藏品編號 5316，原題「臺灣的佔領」，明治神宮奉贊會發行。）參見：〈城現輝煌 建城一百二十週年圖像展〉，臺灣記憶，<http://dava.ncl.edu.tw/voddata/web-taipeicity/north/north.htm>，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¹⁶ 郭秋生的〈王都鄉〉曾對此有所描寫，陳允元便用以說明前朝遺留城牆如何在日治時期喪失原來的社會功能，淪為他者凝視的客體。陳允元：〈島都與帝都：二、三〇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象（1922-1937）〉，頁 118。

曾在入臺不久實施清丈政策，並引起施九緞之亂（1888）。¹⁷殖民政府進入臺灣，土地管理亦被列為首務。一八九八年七月，臺灣總督府公佈《臺灣地籍規則》以及《臺灣土地調查規則》，這也是兒玉／後藤體制對臺提出的首件大型政策。「臨時土地調查工作由「調查／測量／製圖」所構成，亦即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地形調查以及後續的土地申告」；¹⁸「調查／測量／製圖」完成後，隨著土地帳目編制以及地圖繪制完成，日本政府命令各個土地的業主進行「土地申告」，最後，官方再依據土地申告進行丈量，完成臨時土地調查；未申報的土地即收歸國有。藉著人民的申報以建立資料的日本政府，非但確立其於土地的所有權，同時也對住民宣示國家主權之移轉。¹⁹

日人亟欲打造的生活居家和市街經驗與臺人的傳統絕不相同。一八九九年八月公告第一次市區改正計畫，實施地區僅限城內，內容包括城內舊有道路之改建與新設道路之擬定，將整個臺北市打通取直，劃為棋盤式的街道形式，一九〇〇年著手拆除臺北城牆，開通三線道路，即今中山南路，其範圍則為忠孝西路、中華路、愛國西路，即今之中正區。²⁰此即城內日人聚集地。進一步將臺北市的空間圖像，擴展到了中山北路，然而這時臺北市仍然呈現單核心的空間發展形式。²¹本階段的都市計畫為因應殖民統治之目的，不具備都市整體發展之理念。

一九〇五年公佈的臺北市區改正計畫，達到以整體道路網連結三市街，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日本人實施臺灣地方官制及行政區域改制，市區改正，改地名，不再使用路線式街名，改為路段式之町名。同時廢除臺北廳直轄之艋舺、大稻埕、大龍峒三區，設臺北市，隸於臺北州。²²全臺行政區由十二廳改為五州二廳，

¹⁷ 施九緞事件，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期間，實施土地清丈政策。光緒十四年（1888），清丈彰化地區的土地時發生許多弊端，引起民眾怨聲載道。以施九緞為首的當地居民憤而圍攻彰化縣城。等到官方派兵平定民變，並撤換當時的彰化知縣，事件才告一段落。資料來源：劉芳瑜：〈施九緞事件〉，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521>，2012年6月12日查詢。

¹⁸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部關於空間治理的兩種不同城市哲學》，頁214。

¹⁹ 同前註，頁213-216。

²⁰ 何培齊編纂：《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國家圖書館，2007年），頁71。

²¹ 轉引自王驥懋：〈生產者服務業在信義計畫區的發展——以不動產開發機制為例〉（臺北：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9。

²² 「大稻埕主題館」，<http://proj1.sinica.edu.tw/~photo/subject/D-4-GIS/index.html>，2012年6月12日查詢。

實施調整行政區。對城市的管理而言，官方掌握行政區的分劃，因而，行政區是一個比較不常改變的結構，任何變遷都是國家權力的體現。這些改變臺北城的步驟，相當程度地在反映日本治臺權力的逐步落實。

一九〇五年暨一九三二年，都具有奠定臺北都市空間結構之目的，內容包括都市軸線安排、道路機能分級、公園系統規劃、都市景觀考量及空間規劃之主從均有明確理念。經過歷次計畫的修正，一九三六年臺灣都市計畫令公佈實施，臺灣近代都市計畫臻於圓熟。此時期著重於都市計畫、土地區劃。²³

緣著地理位置所在的不同，分劃為區域，隨之發展出不同的機能，如：榮町、大龍峒町、圓山、北投、士林。隨之則是從生活機能差異分劃出的政治、教育、居家、休閒、信仰等不同場域。其三，以聚落性質分，又有日人與臺人的區別。日人大量移入臺灣，亟需居處，榮町即日人在臺北最大的聚居地，而大稻埕及艋舺為臺人居所，為土人區。日本人分區管理殖民地的事實，在一九一〇年進入殖民統治的韓國，獲得進一步証實。韓國也依清川溪兩岸分韓人商業區與日人商業區。明洞即屬後者。²⁴

聚居於榮町的日本人，對臺灣傳統的住宅建物配置、室內構造、建築材料頗不以爲然；至如「土塙」之類，開口小又陰暗潮溼，通風採光不佳，甚至人畜共處，衛生狀況難以卒睹，並不適合居住。在幾次風災、震災後，日人也主張臺灣的傳統住宅無法應付臺灣的海島型氣候與地震。²⁵

橋口文藏²⁶提出臺北家屋建築規則，接著臺灣總督府的衛生工程顧問計師英國人巴爾頓（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 1856.5.11-1899.8.5）也對臺灣的理想家屋

²³ 薛琴主持：《臺北市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報告書·第二章》（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2000年），頁6-33。http://twinfo.ncl.edu.tw/cgi/local/index_list?id=00000636，2012年3月14日查詢。

²⁴ 江寶釵、謝崇耀在〈從瀛社活動場所觀察日治時期臺灣詩社區的形成與時代意義〉一文中曾約略提及第一、二種臺北城都市計畫下出現的區域特色，卻並未注意到族群、階層的聚落特色。文刊《中國學術年刊》第32期（2010年3月），頁209-256。張東天：〈作家與都市認識——以老舍的〈四世同堂〉和朴泰遠的〈川邊風景〉為主〉（演講大綱），地點：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7年3月28日。

²⁵ 薛琴演講、撰稿：「日式宿舍與老樹」（臺北「齊東街」日式宿舍群與老樹故事），「從古蹟看臺北」系列講座，2003年6月26日（四）。<http://blog.xuite.net/blueful/note/3815559>，2012年3月14日查詢。

²⁶ 橋口文藏（1853-1903），於1896-1898年任臺北縣知事。

提出建議：應以日本家屋的形態，「結合臺灣家屋氣候風土上的優點，並輔以歐洲風格設計的日臺西洋折衷樣式」，²⁷同時，並考慮熱帶氣候抬高一樓樓板至五、六尺（約 1.5 至 1.8 公尺）高，比日本民居樓板還高。這類木造日式宿舍除了提供日本移民的居所，同時也用來改變臺人的居住形式。其初，官舍系住宅的興建，係配合當局的政策推行，但日式宅屋的形式確有通風、採光、堅固、衛生的優點，也為一般人所樂於接受。加以皇民化運動的推行，日式宿舍儼然成為尊貴的象徵，到大正末年，民間也開始出現集資的建屋株式會社，建造日式的住宅出售。並向各地推廣「文化村」的建設，大都成南北座向、排列整齊的日式平房住宅，成為當時新興民間住宅建築的一大特色。日式宿舍的規劃，最大的影響是區位的改變，因為它決定了當時臺北市的土地利用形態。²⁸

日人為嚴格規定管理住屋，制定一系列家屋建築的相關法規。一九〇〇年，總督府制定「臺灣家屋建築規則」適用於臺灣全島，其「建築行為許可制」、「使用許可檢查制」，以及對於違規者之「行政執行權」等，更為具體，該規則之「施行細則」於制定之初（1900），即對於家屋之結構、防火、防潮、採光、通風、排水、衛生等事項，訂定相關之規定；一九〇七年修正「細則」²⁹時，更增訂建蔽率、鄰棟距離、建築線、避難空地、防火壁，及類似「容積率」之相關規定，均屬創舉。³⁰

住屋修建與市區改正，正是殖民政府「空間均質化」（homogenization）的實例。透過「空間均質化」以及「空間視覺化」（visualization），國家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寸土地、每一個居民。所謂「空間均質化」——有特定意義地方（異質），都要成為沒有意義（均質）來處理；而「空間視覺化」（visualization）——國家貫通地方共同體的干擾，而所有空間成為可見的（visible）。³¹蘇碩斌在《看不見與看

²⁷ 薛琴演講、撰稿：「日式宿舍與老樹」（臺北「齊東街」日式宿舍群與老樹故事），「從古蹟看臺北」系列講座，2003 年 6 月 26 日（四）。<http://blog.xuite.net/blueful/note/3815559>，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²⁸ 同前註。

²⁹ 詳情可參閱：〈家屋建築規則說明〉，《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7 年 8 月 1 日。

³⁰ 薛琴演講、撰稿：「日式宿舍與老樹」（臺北「齊東街」日式宿舍群與老樹故事），「從古蹟看臺北」系列講座，2003 年 6 月 26 日（四）。<http://blog.xuite.net/blueful/note/3815559>，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³¹ 陳允元：〈島都與帝都：二、三〇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象（1922-1937）〉，頁 18。

得見的臺北：一部關於空間治理的兩種不同城市哲學》中進一步指出，約在一九二〇年左右，臺北已是「一個完整的臺北」的現代都市樣貌。³²

「一個臺北」的出現，是現代國家權力運作的人為產物，「潛藏在這些都市張、空間變化、技術增進的背後，是大清帝國和日本的統治形態之差異。清末『三個市街』到日治『一個臺北』的變化，是『前現代社會』的結束、『現代社會』的來臨、也是『地方社會』的弱化、『空間社會』的興起。」³³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的實踐，所謂全景敞視，意謂著它使權力自動化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於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於肉體、表面、光線、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係」。³⁴所謂的「非個性化」（impersonal），即「全景敞視主義」所建構的空間，係無論人們出於何種目光來使用它，都會產生同樣的權力效應。³⁵

現代國家權力運作的城市，也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實體場域，是我與他、在此與在彼的聯繫。火車站是臺北的入口。倡議於清治一八七六年，興建於一八八七年的臺灣鐵路，第一段工程自基隆到新竹，於一八九一年始完竣，現代化的運輸系統在「孤懸海外」的臺灣被接納，實屬不易。日治之後，陸續完成縱貫臺灣西部的鐵路，一八九九年動工，一九〇八年四月通車，由基隆至九曲堂（今高雄縣），長達 405 公里。

在改變臺人生活空間的同時，一八九五年七月，日本開始對臺灣全島進行戶口調查，「戶口普查的概念，是在一定的時間、地區內，調查靜止的戶口狀態」³⁶由於當時有「土匪」抗日，只能逐步且區域性的進行居住人口登記。³⁷臨時土地調查結束後，客觀的戶籍調查條件成熟，一直要到總督兒玉源太郎於一九〇三年發布《戶籍調查令》，臺灣戶口制度從此進入新的局面，一九〇五年正式展開為期

³²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部關於空間治理的兩種不同城市哲學》，頁 150-152。

³³ 同前註，頁 25。

³⁴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頁 226-227。

³⁵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05 年），頁 35。

³⁶ 轉引自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部關於空間治理的兩種不同城市哲學》，頁 299。

³⁷ 同前註，頁 227。

三天臺灣首次的戶口譜查。³⁸在土地、住屋、居民等陸續進入軌道後，一九〇六年臺灣總督府制定「臺灣浮浪者（羅漢腳、流氓）取締規則」，被取締者依法送入「浮浪者收容所」；實際生活與坐監無異。³⁹

一九二〇年代實施市制，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顯著改變，臺灣已經朝向一個開放性、流動性的社會發展。一九三〇年代，都市人口比例銳增。同時，由於警察制度與戶口調查的落實，有效掌握流動人口，強化居住安全。

在了解殖民政府於市區改正中，對住屋與街景的變革，隱藏在這之下的是，都市地下水道的改正。清領時期，臺灣罕有下水道設計，加上連年颱風帶來的水患，環境衛生不佳，霍亂、鼠疫等天災橫行，因而，日治初期頒布的計畫重點皆以改善環境衛生為首務。首先是制定「臺灣污物掃除規則」，動員保甲組織，定期實施社區環境的清潔活動。⁴⁰接著是聘請內務省衛生工程顧問——英籍的 W. K. Burton 來臺設計上下水道，並負責規劃自來水建設。遂勘定以新店溪為水源之一。總督府建立近代公共衛生和醫療制度。各地設立公立醫院，實施公醫制度。成立醫學校，培養受正式醫學教育的臺人醫師。加強衛生教育，灌輸近代個人衛生知識和觀念。消除衛生防疫工作之阻力，實施預防注射、隔離消毒、捕鼠活動、強制驗血和施藥等防疫工作確實改善臺灣的環境衛生和醫療條件，使臺灣社會防治疫病之效能大為增強，有效防治風土病和傳染病，大幅降低死亡率，使臺灣人口長期呈高自然增加率現象。改變臺灣人的醫療衛生觀念和習慣，臺灣社會漸建立現代的醫療衛生觀念。有關這一部分的論述，請參考吳文星的論文「日治時期的文教與社會」。⁴¹

經歷市區改正計畫的臺北市，街道平坦、筆直、寬敞、美觀，四通八達，商店林立，貿易活動頻繁。當時的市街。交通建設對於戰爭中的日本，有助於殖民者的軍隊調度，但更重要的是，使得流通的進行更具效率，提升商品交換及資本積累的時程。在上述的前提下，我們可看見日治時期的日本，殖民者在臺北城內

³⁸ 陳允元：〈島都與帝都：二、三〇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象（1922-1937）〉，頁 20。

³⁹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999 年），頁 261。

⁴⁰ 「臺灣污物掃除規則」是殖民者根據日本內地污物取締法制定，1900 年 8 月公布，實施期間凡違反相關規定者處於拘役或罰款。資料來源：〈污物取締規則〉，《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1900 年 4 月 21 日、〈除污規程〉，《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2 年 3 月 9 日。

⁴¹ 吳文星：〈第八章 日治時代的文教與社會〉，黃秀政、吳文星、張勝彥等人著：《台灣史》（台北：五南，2011 年）。

附近所興建的建築物及設施，確實是用來達成將臺灣作為日本殖民經濟展示櫥窗，同時榨取經濟利益的殖民統治目標。⁴²

（二）市區改正的社會意義

在這裡，我們要回到街道的傳統與現代功能。一般而言，街道做為地方（place）或空間（space），承載著人們的觀點；它是運輸交換原料、產品的空間，也是人們交流、執行信仰活動的場域。在清代的三市街時期，「這些活動的運作隱含一種文化圖像上的公共規則，這層公共在實際運作中則是由個別的人、商行、宗氏以及信仰團體間的互動決定。」⁴³就艋舺而言，從乾隆三年（1738）艋舺龍山寺興建開始，至光緒元年（1875）設置臺北府，期間一百三十年間，艋舺其實無公家官署進駐，⁴⁴公共事務由地方士紳共同約定管理。而華人街道的實際樣態，則可以從赴龍山寺「取齋」獲得一個概圖：

龍山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為出示曉諭事，照得，艋舺街庄生聚樂安，……近因天氣不順，民志求安，……以禱平安。凡有善信人等，敬備旌旗鼓樂與從，應到本寺口取齋起程，由新店街透舊街，入大宮巷，竹子寮，王公宮口，滬尾渡頭，轉後菜園，將軍廟口，由竹巷尾，入土治街，透廈新街，頂新街，轉北皮寮，營盤頂，破城空，入蓮花街，透祖師廟口，轉草店尾，入直興街，歡慈市，由大溪口入栗倉口，透枋棚，料館口，轉大厝口，後街仔，直透水仙宮口，由頂新街，大眾廟口，回駕入寺。……。

45

傳統華人的街道，以廟為核心，沿著廟兩側街道展開線性發展，「述說著民眾的

⁴² 蔡秀枝：〈城市文本與空間閱讀〉，《文化研究月報》第5期（2001年7月），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2.htm。

⁴³ 范姜松伶：〈「公共」的變遷：以清治、日治初期台北的街道觀點為例〉，《文化研究月報》第57期（2006年4月25日），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7/journal_park437.htm，2012年6月12日查詢。

⁴⁴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部關於空間治理的兩種不同城市哲學》，頁55。

⁴⁵ 艋舺龍山寺全志編纂委員會編：《艋舺龍山寺全志》（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全志編纂委員會，1951年），頁21。

自主活動，該話語根據寺廟輻奏展開、依商行聚落呈線性延伸。」⁴⁶甚至於在「命名」就已經透露出強烈的地方訊息，所有的命名都依「地方特色」而制定，如草仔店、蓮花街、將軍廟口等等。

總督府所代表的國家力量以「市區改正」的規劃，主導了公共的意義，並賦予街道、行人與行車新的規範，各個公共領域空間遂意識形態化。蔡秀枝在〈城市文本與空間閱讀〉一文中指出：「這是空間符號系統的符號所指，經由符號系統而符碼化的意義建構。它清楚地標示出空間中種種限制與約定，並用以傳達公共空間中眾人必須瞭解與遵守的行為規範。」⁴⁷在清代，為阻止漢人對原住民的侵擾，在每一座山的入口建置土牛界碑；而拓建後的道路也出現各種使用的規定。底下這一段話摘自呂赫若的名作〈牛車〉：

被燈籠底光濛然地照著，路碑站在那裏。

「你媽的！」一聲喊，他動手打倒路碑。但只是發出拍拍的聲音，無論怎樣打路碑卻一動也不動。他狠狠地低聲喊了。

「呔，這混蛋——」

「好的——來啦！」

喊著跳了出來的男子馬上找來了一個大石頭。兩人舉了起來，用力地撞上去。撞了兩三次，路碑就不費力地倒了。

「看你狠！」

拋到了田裏以後，兩個人大聲地笑著轉來了。⁴⁸

市區取正、道路改建後，也改變了住民商業活動的形式，影響市井居民的生活：

雖然是那樣無知的楊添丁，但也感到近年來自己一天一天地被推下了貧窮底坑裏。慢吞吞地打著黃牛屁股，拖著由父親留下來的牛車在危險狹小的保甲道上走著的時代，那時候口袋裏總是不斷錢的。就是悠悠地坐在家

⁴⁶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部關於空間治理的兩種不同城市哲學》，頁 199。

⁴⁷ 蔡秀枝：〈城市文本與空間閱讀〉，《文化研究月報》第 5 期（2001 年 07 月），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2.htm，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⁴⁸ 呂赫若：〈牛車〉，向陽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文學金典：小說（日治時期）》（臺北：聯合文學，2006 年），頁 285-286。

裏，四五天以前都爭著來預定他去運米運山芋。當保甲道變成了六間（一間等於六尺）寬的道路，交通便利了的時候，就弄成這樣子，自己出去找都找不著，完全不行了。⁴⁹

呂赫若的這段描述仍可以借用蔡秀枝的觀點加以解釋，當道路成為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內的限制與法規是在政治與社會的契約內，人們必須遵守。對符號系統的所指與能指的基層意義的認知，是空間得以維持並再製的方式。但是做為一個行動的主體，人們的舉止總是可以在法規之外。所以即使有著共同的、公眾的符號系統，並且這個系統中的符號的表述與內容也是被眾人所認知，亦無法保證人們在空間中的行為一定會接受規範的約制。因為符號內容的指涉部分，甚至更深層的意涵是否能達到它預期的目標，並非整個固定的符號系統所能預設與掌握。底下這一段，是台中市⁵⁰一群依牛車運輸維生的小市民對於繳稅後被禁止使用馬路的心情，以及因此而故意違反規範的行動：

他們白天常常從路碑底旁邊經過，每次經過，反抗心就按捺不住地湧了起來。常常想找機會把那弄掉。路碑上寫著：道路中央四周不准牛車通過。因為用小石頭鋪得坦平的道路中心是汽車走的。

「我也繳稅的呀。道路是大家底東西。汽車可以走的地方我們不能走，有這樣的道理麼？」

但是，雖是這麼想，但白天覺得大人可怕，沒有由那通過的勇氣。他們曉得，如果不小心地被發現了是在道路中心走，罰錢以外，腦殼還要被打得咚咚響的。——這樣地，道路中心漸漸地變好，路旁的牛車道都通行困難起來了。⁵¹

從上文，我們發現新設施造成舊產業的淘汰，指出城市空間對住民活動具限制性的某種現實，也指出殖民者壓制性的教化：罰錢、被打腦殼。除了呂赫若的〈牛車〉外，我們也發現，創作活動本身正形成都市本體的社會實踐之一。一旦作為

⁴⁹ 呂赫若：〈牛車〉，頁 275。

⁵⁰ 由於並未發現台北市書寫的相應文本，因而聊以呂赫若的台中市書寫做為旁證。

⁵¹ 呂赫若：〈牛車〉，頁 286。

符徵的都市造形被我們視為「外部現實」的道具，那麼作為符旨（signified）的都市生活變成「內部現實」存在的現場，而個別的符旨又可以成為更深一層指意的符徵。朱點人（1903-1949）〈秋信〉裡寫傳統知識分子對殖民現代化發展的陌生與疏離：

在混雜的人叢裡，每一移步，腳尖都要觸著人們的足跟、他一跛一跌、好容易被人波推到左邊的一角。他擡起頭來，望一望街上，許多自動車在街心交織著，十字路上築一座城門，他猛然看城門上寫著「始政四十週年紀念」，驚心駭魂的他頓時清醒過來。然立在前面的雄壯的建築物，像在對他擗笑，他搖搖頭想起「王侯茅宅皆新立，文武衣冠異昔時」的字句，胸裡有無限滄桑的感慨。⁵²

首先，他是「一跛一跌」的，跟不上殖民現代性的遺民；而城門上「始政四十週年紀念」，「驚心駭魂」，與隨之而來的雄壯的建築物對他「擗笑」，他跟著想起的朝代的移易，或者正是無所不在的殖民威權，我們在這裡可以思考陳芳明的看法，他認為：「斗文與其說是一位守舊者，倒不如說他是一位反現代化者。他對現代化的抗拒，其實是對日本殖民化的抵制」。⁵³或者借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話說，傳統的閉鎖系統，使斗文得以保持與現代性的距離，理解殖民的本質，加以批判。⁵⁴然而，就像閒逛者⁵⁵在人潮中觀看都市，自己不得不也成為被觀看的都市中的人潮，斗文的踉蹌無力阻止前進中的殖民現代性列車。

然而，現代性的象徵物，支持著生活便利、舒適的各種器物，有時候，也扮演了催化殖民性的角色，龍瑛宗的短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雖然寫的是南

⁵² 朱點人：〈秋信〉，張恒豪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臺北：前衛，1991年），頁232-233。

⁵³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麥田，2004年），頁103。

⁵⁴ 陳允元認為現代性意味著「殖民化」、「排他化」，正因為斗文深刻了解現代化的結果使他喪失興家立業的機緣，故而斗文很難不以一種排拒、敵視的態度看待現代化。另一方面，斗文也因為現代化造成臺灣「歷史感／地方感」的消失，而感到悵然若失。參見陳允元：〈島都與帝都：二、三〇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象（1922-1937）〉，頁148。

⁵⁵ 閒逛者（flâneur）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使的詞彙，用來指在城市中無所事事地走在人群中的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臺北：麥田，2010年）。

投埔里的一個小鎮，卻可以挪用以理解被殖民者因城市現代性的進展而產生的感情結構的變化：

街道污穢而陰暗，亭仔（騎廊）的柱子熏得黑黑，被白蟻蛀蝕得即將傾倒。為了遮蔽強烈的日曬，每間房子都張著上面書寫粗大店號——老合成、金泰和——的布篷。

走進巷裏，並排的房子更顯得髒兮兮地，因風雨而剝落的土角牆壁，狹窄地壓迫胸口；小路似乎因為曬不到太陽，濕濕地，孩子們隨處大小便的臭氣，與蒸發的熱氣，混合而升起。⁵⁶

走到街的入口處，右邊連翹的圍牆內，日人住宅舒暢地並排著，周圍長著很多木瓜樹，穩重的綠色大葉下，結著累累橢圓形的果實，被夕陽的微弱茜草色塗上異彩。

「這裏是社員的住宅。我要是再忍耐五年，便可從那豚欄小屋搬到這裏來住。但是其他的人就可憐了，對他們而言，這裏不過是『望樓興歎』而已，因為他們沒讀中等學校。」⁵⁷

陳有三的視覺「污穢而陰暗、被夕陽的微弱茜草色塗上異彩木瓜樹，果實累累」如何引導他，決定他觀看的方式，與他「身在其中」的浸染，「剝落的土角牆壁，狹窄地壓迫胸口；舒暢地並排著」，因為是各種感官經驗，視覺、直覺、文化意識、社會形態與科學觀念交互作用，而後轉變為直覺的空間觀，內化為意識形態的控制，形塑了他的地方感性與感性知識，建構族群認同，進而結構為國族意識「我要是再忍耐五年，便可從那豚欄小屋搬到這裏來住。」陳有三對傳統街道巷弄與宅屋的嫌惡，以及對日式住宅的嚮慕，顯示後期擁抱現代性挾帶殖民性一起的案例。通俗報刊登載的曉風的作品〈新春的街頭〉更進一步將馬路鋪上亮燦燦的陽光：

鳴！鳴！鳴！／風馳電掣地閃過，／襯著一對青春時代男女

⁵⁶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向陽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文學金典：小說（日治時期）》，頁 203。

⁵⁷ 同前註，頁 208-209。

太陽射著柔軟的光芒！／嘻！嘻！嘻！
一群少女在和暖的馬路姍姍踱過……⁵⁸

馬路上湧動著生命之水流，和暖、明亮地，充滿希望地向未來風馳電掣地開展下去，而被改造臺灣人的地方感性在這裡毫無造作地表現出來。殖民政府創造的新時代序幕拉起。許多新的興築還要一個一個地跳上舞臺，參與青春的大展演。

三、不斷改變中的「臺北天空」——新興建築的殖民性與現代性

「城市裡的每樣創新，都會影響天空的樣子。」⁵⁹這是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1923-1985）在《看不見的城市》一書中的名言。創新的另一面，便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觀察，城市永遠在壞毀之中。⁶⁰創新與壞毀，成為人的空間感的一部份。⁶¹而人的空間感的形成，或許可以從「知覺影像」（Perception-image）說起。「影像」（image）係指諸物質（matiere）的總合（aggregate）；而「知覺」（Perception）是對於當前「影像」的直接認識，施於物質的現實行動。空間觀念先由視覺感官傳入人的腦海，因而如果我們回想及某件曾經在世界上存在過的東西，或者心裏對那件東西有一個影像，進而有所知覺，那麼，我們就立刻有了所謂「空間」（space）的觀念。這是一種想像的空間，因為它只是一種影像，可是這正是所有的人稱為「空間」的東西，這個說法，可以證明人們奮力地從事區域建築特色的建構，形成所謂的地標，而地標又如何介入我們的「空間」感？我們想起信義路，「臺北一〇一」即自動浮出心靈的地平線。空間感受是綜合人類的各種感官經驗聚積於諸物質而來，然後轉變為直覺。在轉變為直覺的過程中，各種意象、文化意識、社會形態與科學觀念交互作用隨之而來；因而，李永熾指出，「關

⁵⁸ 曉風：〈新春的街頭〉，《風月報》第100期（1940年1月1日），頁15。

⁵⁹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1993年），頁185。

⁶⁰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譯：〈歷史哲學論綱〉，《思與文》，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ttg/benyaming/005984.htm>，2012年3月14日查詢。

⁶¹ 柏格森（H. Bergson）著，張君譯：《物質與記憶》（臺北：先知，1976年）。

東大地震（1923）改變了東京的都市空間，掌握新的都市空間，勢須有新的表現方式。此時，歐洲現代主義開始傳入日本，『新感覺派』和『新興藝術派』都是在現代主義影響下成立的。」⁶²這段話我們至少可以有以下兩種解讀：其一，當我們觸及日本新都市的空間感，將挾帶著關東大地震此一自然事件所帶來的社會意義，前此的舊東京空間的生活樣態，以及後此的改變。其二，足以掌握東京空間感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即「新感覺派」和「新興藝術派」的建築暨其表現。

沿用李永熾的思考，因應實際需要，而稍作修訂，我們的討論將是，如前文所述，市區改正確為臺北創造了新的都市空間，得以凸出此一空間感的建築暨其表現形式是什麼？不斷出現於街道的新建築將是思考的指標。其次，我們特別注意這些新建築有怎樣的功能？產生怎樣的社會意義？為避免「建築」一詞過於僵化於建築體本身的刻板印象，本節代以「興築」，既指涉建築體本身，也指涉建構建築體的意識形態、建築與庶民生活互動、影響。主要關懷定焦於臺北中正區，分「政治與經濟」、「教育與休閒」兩大脈絡述論。

（一）政治與經濟的興築

市區改正，整建街廓，為使都市中心區更為暢通，有三線道的興築，穿過忠孝西路、中華路、中山南路。三線道上，市營巴士班次的密集程度與今日不相上下，殖民政府開放給臺灣人使用的汽車，川流不息。然而，對於一座城市而言，僅有道路銜接內外是不夠的，它還需其他更有效的工具。通車後的縱貫臺灣西部的鐵路，輔以私鐵及手押軌道，在西部平原形成了緊密的交通網，正以臺北為最大站，迄今沒有改變。一九一〇年代，臺北（火）車站重建。

臺北車站是臺北城的入口。火車站座落於三線道路，正對表町（今館前路附近）。步下火車，就可以看見現代的臺北城：整個城市劃為棋盤式的街道形式。

道路、鐵路仍無法形成交通的全部。王志弘曾提及：

「流動」（flow）這個概念指稱實質空間裡一切人事物的位置變換，包括一般所稱的「運輸」（transportation，人與物藉由運輸工具往來）和「通

⁶² 李永熾：〈谷崎、川端與一九二〇年代的淺草〉，《當代》第38期（1989年6月），頁46。

訊」(communication, 訊息、資訊的流通), 也包含特殊的課題如流浪、放逐、旅行、遷徙。⁶³

郵政扮演著「通訊」的主要角色, 係掌握臺灣對世界的窗口。郵件的運送與鐵路的關係密切, 明治三十一年(1898), 郵便局遷往鐵道部對面, 改稱臺北郵便局, 並開辦為替貯金業務。一九〇〇年實施「郵便法」, 逐步建立全臺的郵政系統, 並開辦臺灣與外島、日本、中國、東南亞間的郵政業務。⁶⁴日治初期因地方接管困難, 行政區域劃分大致與清朝相同, 成立的郵便局所均冠街名。「町名改正」之後, 改為路段式之町名(1922)。明治四十年(1907), 將原來「郵便電信局」改稱為「郵便局」。⁶⁵大正九年(1920), 另設電信局與電話局。⁶⁶

道路的改變除了影響都市內外的交通運輸方式, 其寬敞與否決定建物的體積與高度, 自然影響了沿路建物的建築形式。總督府位於「貫穿四個主要城門街道的交點上」,⁶⁷象徵國家管理與控制, 是國家政治秩序維繫之所在, 也是「正統」價值觀的主要場域。為宣示威嚴, 日本史上第一次公開徵選大型公共建築, 由長野宇平治的設計圖獲選, 由森山之助執行建築, 明治四十五年(1912)起建, 大正八年(1919)竣工, 用地一〇八〇六坪, 工事費用三百五十萬圓。⁶⁸整體平面呈「日字形」, 風格受英格蘭磚造建築影響, 五層樓, 正面中央高塔從六樓提高到九層, 高約六十公尺, 當時臺灣最高的建築物, 成為當時臺北市區任何地方皆可望見的高塔。⁶⁹係「看得見的權力」最清楚的表徵。

在一張署有「臺灣所見」——「臺北：臺灣總督府」的明信片上寫著：

⁶³ 王志弘：〈都市流動危機的論述與現實——臺北「交通黑暗期」的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期（1991年12月），頁105-182。

⁶⁴ 〈日本統治前期【三、殖民經濟的奠定】〉，認識臺灣，
<http://192.192.159.187/9taiwan/taiwan1.htm>，2012年3月4日查詢。

⁶⁵ 曹潛：《中華郵政史·臺灣編》（臺北：交通部郵政總局，1981年），頁174。

⁶⁶ 同前註，頁176-177。

⁶⁷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部關於空間治理的兩種不同城市哲學》，頁248。

⁶⁸ 何培齊編纂：《日治時期的臺北》，頁18。

⁶⁹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一部關於空間治理的兩種不同城市哲學》，頁248-249。

不用說是臺灣全島的行中樞，廳舍是在市中心，被誇為宏壯堂堂美侖美奐。氣弱的內地人，初見到此景，首先即為臺灣其景物所迫喪膽。⁷⁰

在臺灣總督府廳舍的明信片上，寫道：

臺灣進行曲 二、皇威光輝溢滿地，新民茂盛似草。文化之潮亦布及南方，以澎湃之勢躍進。啊！太陽旗高揚呀！皇道所及皆平和，躍進日本我的臺灣。⁷¹

殖民政府展示臺灣，並以臺灣為現代化櫥窗，因而即便日本人亦為之喪膽；而臺灣的現代性係做為皇威宣揚之地，因而，這個看起來似乎矛盾的邏輯卻在這裡獲得一致性。也就是臺灣現代性係日本皇威實踐的成就。總攬行政、立法、司法等大權。

以總督府為中心的「中正區」實為殖民地傾力建設的區域，如今仍是臺北市政核心的地景。從三線道中山南路的地圖上，其身世，從昔名介壽路而今作凱達格蘭的大馬路，立法院、介壽公園、二二八紀念公園向前延伸，臺灣土地銀行與北一女、最高法院夾峙，右轉再往前走，則是電力公司、座落在小南門外的專賣局。整個重慶南路上的臺灣銀行、菊元百貨、郵局，即已展開殖民／後殖民、都市／資本主義的對話，臺灣銀行（1899）位於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臺灣銀行成立的目的，有：（1）幣制改革，發行臺幣；（2）以臺灣為基地，協助日本企業向華南及南洋擴展；（3）提供融資服務，以利臺灣工商業及公營事業發展。⁷²勸業銀行（1933）位於中正區襄陽路口，今日為土地銀行。「勸業」在日文有「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提供臺灣產業大量資金以利土地開發與農田水利等事業之投資。兩大銀行在當時執金融業之牛耳。

為了維持島上的建設，以及社會的繁榮，臺灣總督府專賣，官方控制各種品

⁷⁰ 松本曉美、謝森展編：《臺灣懷舊（1895-1945）》（臺北：創意力，1993年），頁115。

⁷¹ 〈臺北風華錄〉，http://memory.ncl.edu.tw/tm_new/subject/taipei/taipei01a.htm，2012年3月14日查詢。

⁷² 許雪姬：〈臺灣銀行〉，《臺灣歷史辭典》，<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14/cca220003-li-wpkbhisdict003941-1159-u.xml>，2012年3月14日查詢。

物的貨源、價格、收支等獨佔事業，如食鹽、煙、酒、鴉片、樟腦、石油、火柴、度量衡等，實施有年，其衍生收益達該府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如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的觀察，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性並不是完美無缺。⁷³公賣制度對庶民生活的影響，孤峰的〈流氓〉幾乎是深入的實錄，失業的男主人每日上班就到公園遊蕩，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支冰牌，與他遭遇類似的人還有許多，幾乎形成了一個小的社群。⁷⁴賴和的〈一桿「稱仔」〉更是以公賣度量衡為小說名稱，指出統一度量衡以警察系統為執行的力量，小市民無力理論，備受殘害。為求糊口的秦得參想做個小生意，他的妻子先是跟娘家的嫂子借根金花典當，做為進貨的錢；又跟鄰居借一桿稱仔；秦得參到市場賣菜，這桿稱仔被他的警察顧客誣為不準確，鎗鎗入獄。做妻子的拿著賣菜賺得的三塊錢繳交罰款，秦得參才被釋放，可是金花贖回無著，稱仔也被沒收了，陷入悲慘的深淵。⁷⁵

在建築表現而言，臺北火車站以後期文藝復興式建築為主，在建築凸出的高塔上裝設大型時鐘，時鐘由站內移至站外，正是時間意識的養成。⁷⁶金融機構的建築強調國家經濟的權威，金融的穩定與安全，其建築牆面使用石材，皆有巍峨的柱廊，表現出古典主義的嚴謹而優美的比例，並考究簷口飾帶及柱頭裝飾。專賣本來屬臺灣總督府職權，由於事業規模日益壯大，遂在南門附近完成辦公署的建置（1922），建築由臺灣總督府特聘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形狀近倒 V，擁有六層樓高的尖塔，是 Mansard roof 式，鋪陳銅皮頂、白紅色橫帶與精緻浮塑裝飾。柱式、山牆、翼塔、門廳及拱廊等等，頗近似同一時期落成的臺灣總督府。⁷⁷郵便局原洋風木造火災後重建（1928），位置向北移，由總督府營繕課栗山俊一設計，主要為 I 型鋼樑鋼筋混凝土結構、壁體為 2B 磚造三層樓，使用簡化的古典建築語

⁷³ 波特萊爾一再以貧民對照富人區即為一證。見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現代生活的畫家〉，汪民安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開封：河南大學，2005 年），頁 621-638。

⁷⁴ 孤峰：〈流氓〉，施淑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37-39。

⁷⁵ 賴和：〈一桿「稱仔」〉，向陽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小說卷（日治時期）》，頁 15-24。

⁷⁶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年），頁 93。

⁷⁷ Ting：〈臺灣省專賣局〉，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6462>，2012 年 6 月 13 日查詢。

彙，裝飾與線條都極簡潔，表達郵政最需要的明快與效率。⁷⁸

金融業的確立係經濟發展的表徵，從而帶來豐庶的物質條件，使得資本主義益形茁壯。銀行所代表的金錢，與消費向來形影不離，因而很自然的，兩座銀行不咫尺便矗立著現代化的櫥窗：菊元百貨公司，號稱「七重天」。這是臺灣第一座最高的商業大樓，位在最繁榮的榮町通（今衡陽路與博愛路口），即「大和生活圈」。

⁷⁹

茅盾《子夜》中的上海城，到處都可以看到洋樓上的霓虹燈：

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站在暝色中，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東張西望。叫人猛吃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 Neon 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赤光和青鱗的綠焰。⁸⁰

以上文字指出電力是現代科技文明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為一切工業技術與發展所必需。戰爭末期，在厲行建設三十餘年後，臺灣成為南進基地，推動工業發展的條件日漸成熟，一九三九年為止，全臺共有發電廠 135 座，供電能力約 37 萬千瓦。當時臺灣民間的需求才七萬千瓦而已。在茅盾的譬喻裡，霓虹燈是怪獸的眼睛，在城市中無所不在，改變了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規律與習性，建立新的秩序，赤光和青鱗吸引著人們參與資本主義的消費活動，卻也似乎要將人們吞噬。而許多日治時期的臺北書寫，亦著眼於暮靄中逐一亮起的華燈，而亮起處，就是怪獸商店街，以及百貨公司。根據呂紹理的研究，「不僅商家旅店食堂以裝設電燈作為誇示豪華新派的象徵，以電燈照射招牌或以電燈排列圖案作為廣告的手法，也廣為利用。」⁸¹百貨公司，是資本主義的表徵，燈光鼓湧、折射出購買的欲望：

⁷⁸ 〈日治時期臺北郵便局落成紀念〉，原載於《府城郵友會刊》第 37 期「秋季刊」，<http://blog.sina.com.tw/stampinged/article.php?pbid=1324&entryid=3869&comopen=1>，2012 年 3 月 4 日查詢。

⁷⁹ 張君豪：〈菊元百貨〉，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7607>，2012 年 6 月 13 日查詢。

⁸⁰ 茅盾：《茅盾全集：補遺》（北京：人民文學，2006 年），頁 3。

⁸¹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20。

夕陽掛在東山的高峰，映著柔弱的餘暉。太平町的行人如蜂般的擁擠，商店的門口五光十色的掛著「歲暮大賣出」的招牌。百貨店的店員，忙著東斟西應……⁸²

五光十色係「歲暮大賣出」，解釋店員忙碌的原因。燈光逗引凝視，凝視激發如蜂般的消費欲望。這段話不過是如實的描寫。燈光與商店在王詩琅（1908-1984）的〈夜雨〉這篇小說裡，卻另有深層的指涉。主角是一位因為罷工而失業的印刷工人，為了維持家計，他的女兒只好去擔任女招待。對於這樣的情節，陳芳明在〈王詩琅小說與左翼政治運動〉指出：「罷工的行動，原是對資本主義殖民體制表達強烈的抗。結果，罷工作敗等於化表資本主獲勝。如今，女兒又即將成為資本主義的商品，殖民體制獲勝於此又得到證。」⁸³現在，他與妻子吵了一架，在路上漫無目的地行走，卻看到：

廣闊的太平町道、兩旁櫛比的大店舖，被薄暮的夜色籠罩起來了。
輝煌的電光，漸漸地逞威、要代替太陽支配世界了。⁸⁴

他看到電燈代替太陽「逞威」，人造的現代象徵物取代自然物，農業生活早已向工業生活轉移。而「剛開業未幾的咖啡店——「娜利耶」：在這十字街頭角現其麗姿宏亮的留聲機的嬌聲，紅紫的「良·薩茵」（霓虹燈）來粉粧這近代女性的豔容，添一新的魅力。」⁸⁵很可能這就是女兒將來上班的場所，他不只是罷工敗給資本家，女兒更將成為被資本所消費的商品，而他自己，走在街上，到處是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及資本主義勝利的示威。

百貨公司的現代性，只是建立在霓虹燈，更在於它的空間表現。監獄、痲瘋病院的空間，以有高度監控之需要，乃得以遂行「關係權力」（relational power），傅柯的分析指出，這類具有「個別觀察、分門別類、以及空間分解組合」⁸⁶的特性，

⁸² 曉風：〈除夕之夜〉，《風月報》第124期（1941年2月15日），頁17。

⁸³ 陳芳明：《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頁106。

⁸⁴ 王詩琅：〈夜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臺北：前衛，1991年），頁21。

⁸⁵ 同前註。

⁸⁶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228。

而「解析空間分配、間隔、差距、序列、組合的機制，以便揭示、記錄、區分和比較」。⁸⁷這種切割、重組空間，也用於百貨公司。百貨公司的高樓矗立、大片落地透明玻璃的使用，貨品分層歸屬，放在透明櫃裡，菊元商行的一樓到四樓為各式商品賣場；五樓提供日式餐飲菊元食堂；六樓做唱片賣場；七樓設餘興場所與屋上庭園，⁸⁸完全以一種組成知識分類生產的方式進行建構。而物品的擺置更揣測購物者的需要，形成動線。百貨公司的空間是「奢華民主化」的「消費學校」。它的門戶大開、免費入場，鎮日有女性服務員陪侍於電梯口，並提供冷暖氣與燈光，建構的是一種「舒適宜人」的買賣。其基礎為資本主義。貨幣經濟與私有財產制。這與監控的「政治解剖學」的權力操作，不無相似之處，雖然，百貨公司營造的並非監控的凝視，而是令人沉醉的羅曼氣氛，引起愉悅的凝視，從而建構（the romance in commerce）貿易。菊元商行如此，臺灣第二間百貨公司「林百貨店」亦然。⁸⁹百貨公司暨其形態，在社會上不斷地「複製擴延」（reproduction），此一行為，具有重要的社會意含，可以在此略事討論。

我們審視百貨公司的形態——建築、分層與擺置，與博物館一樣，具基本的法則，在固定空間中藉由物件擺置而堆積「時間」的場所，即傅柯所謂的「異位」（heterotopias），與現代城市的興築相似，是一種全景敞視主義的安排。這種挾帶全景敞視主義下的異位空間，廣泛地出現於十九世紀的西方，無論是旨在嚴肅教化功能的博物館、以經濟貿易為目的的商品陳列館，或膜拜消費主義的百貨公司，追求刺激歡樂的主題遊樂園（amusement park）等等，都普遍存在的盯視（gaze），而這種盯視與為其盯視的對象之間，形成了廣泛而複雜的糾結關係，班納特（Tony Bennett）稱之為「展示叢結」⁹⁰（exhibitionary complex），易言之，透過建置化的

⁸⁷ 同前註，頁 234。

⁸⁸ 請參考王慧瑜對菊元百貨的描述：〈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1895-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38。

⁸⁹ 其樓層分割，一樓：菸酒、洋菓子、化妝品、食品、鞋子。二樓：童裝、雜貨。三樓：布料、服飾。四樓：文具、玩具、日式餐廳。五樓：西式食堂、喫茶室。六樓：機械室、瞭望室。參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2005 年），頁 111-113。傅朝卿：《日治時期臺灣建築（1895-1945）》（臺北：大地地理，1999 年），頁 93。

⁹⁰ 「展示叢結」（exhibitionary complex）是班奈特（Tony Bennett）沿用傅柯的概念，說明展覽傳遞知識給觀看者，同時它也傳達權勢機關的意志。Bennett Tony,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1995), p.63-66. 亦可參考呂紹理的相關論述：《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學科體制，聯繫更為複雜的權力／知識／規訓的系絡。殖民知識建構與帝國／殖民控制與文化霸權等多方面的討論。百貨公司無疑是現代貨幣經濟的代表、資本快速積累、機械大量生產、高度消費市場與私有財產制的形成，它以貨幣鬆動既有社會秩序、甚至男女性別關係、僅以貨品（product）／商品（commodity）作為分類標準，分疏顧客（customer）／消費者（consumer），這時候，社會分工的解組與重構成爲動態與流動的社會關係，舊階層關係不再，新階層關係依控制與被控制不斷複製，如政府與公務員、工廠與工人、店員與顧客等等，進行社會文化認同的建構。王詩琅在十字路裡寫道：

井原百貨店前的「蕭子維著」裡，這頂鼠灰的中折帽，雖是帝國製帽的國產品，但帽型或是色澤，在這櫥外看起來卻絲毫沒有遜色同僚們誇耀的那些舶來貨，他站在這亮晶晶的笨大的琉璃櫥窗前，呆呆地癡視，躊躇了已經好久了。融在均和的電光裡的那頂帽好像嫵媚的夫人在伸手招他。老實想想頭上戴著這頂舊型，又是賤貨，實在太勻配不起這副新洋服，這領新外套。而且在他們的面前，始終要感覺難過和不快。更是難堪。他於是也不管剛才領的賞與金夠不夠開發了，擡起臉，昂了頭，聳聳肩膀，將手插入纔新作成的黑外套，大踏著步，跨入店內去。⁹¹

百貨店櫥窗裡的帽子逗引著閒逛者的消費欲望，如同嫵媚的夫人，以及賞與金是否足夠都不在話下了。這是展示從欲望到貨幣、顧客／消費者的最佳說明。又如當時的百貨公司中，熱帶地區的棕櫚樹成爲點綴空間的道具佈景，活人土著秀穿插在殖民地商品之間。將對現代異質的生活方式視爲他者，作為對照於進步的現代物品的擺置，是另一種看不見的社會文化建構。性別自然不能例外。一連串的新國民身體運動，女性解纏、受教育、擁有工作能力，並爲職場所需求，成爲人力資源重組的重要對象。大量中下階層女性走出家庭空間，進入城市中的百貨公司工作，成爲女店員。站在貨櫃旁邊，她們的身體、扮妝，成爲商品展示的一部份。女性的知識與職場能力，爲她們帶來消費能力，百貨公司的展示對象，女性爲主要對象，甚至引來無數的「摩擦者」（frotteurs）。曉風在〈大馬路與小馬路〉寫及百貨公司燈光照射下女人的胴體，以及女人與男人肌膚摩擦的那一剎那：

⁹¹ 王詩琅：〈十字路〉，張恒豪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頁 69。

霓虹燈燦爛地把大馬路照得像白晝那樣的——明亮，汽車和人，是潮般的擠著；男人和女人，擁著，擠著。女人的頭髮給電燈耀著，有時也會反射出光亮來，百貨店的店員，都為應接她們而忙碌，她們的大腿和雪白得像藕的玉臂，有時也會和男人的身體觸的摩擦了一下，在這時，你倘若注意一下，就會聽到一聲嘹亮富有媚力的噯呀一聲。⁹²

「摩擦者」意謂著的性騷擾，寫得雲淡風輕，甚至以「富有媚力」折射出閒逛者的男性視角，透露性別中的父權結構。此外，在摩登的百貨店裡，指導人們都市生活的時間，自然亦不可或缺，一再地出現：

時鐘告訴人們十一點了，五光十色的店鋪，都關了店門，播音臺也停止了音樂的播佈。大馬路靜悄悄的，只有陣陣女人的香氣和酒臭隨風飄蕩著，路燈閃爍的光芒下，一群一群穿著綺麗的衣裳的女人，走過去，走過來，人力車的鈴聲和醉漢的笑聲混雜著，醉漢們有時也會跑到女人面前，說了幾句笑話，跑開了，她們嘻嘻地吸著香煙，姍姍地在大馬路上消失了。⁹³

時鐘、店鋪、播音臺，持續還在街上活動的是女人的香氣和醉漢的酒臭，隱喻資本主義消費墮落的層面。陳世慶〈水晶處女（十三）〉裡寫道：

島都原來是個繁華的都市，加之新正的點景；那好似錦上添花一樣了，紅的，綠的，男女如雲，陽光滿地，音樂盪揚於天空中，碧淵和玉冰，姑母同坐在自家用的自動車，在街上走了一迴，碧淵祇覺的無甚可玩的地方，當自動車跑著 C 町的時候，他吩咐了運轉手，說要在 A 百貨店前下車。⁹⁴

感到無甚可玩、無處可去的人們，在街上繞了又繞，最後，都被吸進百貨公司裡去了。李騰嶽的絕句呼應了這樣的觀察：「摩天樓閣七層雄，肆面宏開百貨充。卻笑儂家非顧客，也隨人去坐流籠。」⁹⁵不想買東西，也可以跟著閒逛。而痴音的〈大

⁹² 曉風：〈大馬路和小馬路〉，《風月報》第 132 期（1941 年 6 月 15 日），頁 8。

⁹³ 同前註。

⁹⁴ 陳世慶：〈水晶處女（十三）〉，《風月報》第 104 期（1940 年 3 月 4 日），頁 10。

⁹⁵ 原出處李騰嶽：〈菊元百貨〉，《臺北竹枝詞》。轉引陳家瑄：〈文字圖像經驗下的臺北市

都會〉寫百貨公司的閒逛樂趣：

百貨店，真利市／去・退，坐電梯；／
店內姑娘生真美……／面也美，衫也美，
嬌聲目箭『沙比斯』極古錐。⁹⁶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百貨店這種新興建築在殖民現代性中所呈現的特殊意義。

（二）教育與休閒的興築

構成臺北的都市景觀的，還有象徵進步的知識建設：學校，以及其他相關建築。吳文星指出，日人治臺，以漸進的同化為原則，基本上由現代化教育政策與差別待遇教育制度兩個軸線構成。⁹⁷因而，初等教育設施的公學校遂成為殖民教育之重心。一九一九年，根據差別原則頒布「臺灣教育令」，⁹⁸臺人的教育機會仍無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權。一九二二年頒布新「臺灣教育令」，⁹⁹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學校除外）取消臺、日人的差別待遇，開放共學，惟差別待遇的本質不變。一九一九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致力於公學校之增設，一九一九迄一九三二年間，由 438 所增為 715 所。而臺北最多的公共建築是具備教育功能的學校。據臺五十一年期間興建近百所各級學校，大多分布在腹地大的新興區；¹⁰⁰如州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靜修女學校——位於臺北市日新町，西班牙傳教士為校長，日本人協助成立，臺北最早的私立學校。

公學校為總督府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機關，但亦有助於現代基本知識的傳播，促進臺灣社會現代化。由於總督府長期本乎差別待遇原則實施教育，只偏重

庶民生活〉（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8 年），頁 38。

⁹⁶ 去・退，音 tshit-thô，遊玩。沙比斯，service。痴音：〈大都會〉，《風月報》第 111 期（1940 年 6 月 15 日），頁 11。

⁹⁷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台北：五南，2008 年），頁 85。

⁹⁸ 參〈臺灣教育令〉，《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19 年 1 月 8 日。

⁹⁹ 參〈臺灣教育令公布〉，《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22 年 2 月 8 日。

¹⁰⁰ 研究單位中原大學建築系：〈第二章都市發展歷程下的日式住宅分布〉，台北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http://web.bp.ntu.edu.tw/bpresults/jhouse/index1.htm>，2012 年 6 月 13 日查詢。

初等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明顯不足，企圖將臺人同化在日本社會的底層，因而激發臺人的不滿和自覺，成為反同化主義的動力，阻礙了對日人和日語的認同。隨著教育的普及，公共建設的建置，臺灣人的日常生活開始具備國民社會（national society）或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性格。

在教育明確實施的場域之外，現代性之一，即庶民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休閒學習與終身學習，英文的「公園」，最早的字義跟現代不同，意指王侯貴族富商獨佔使用的狩獵場和大庭園。除非獲邀，擅入者不被處死，也會遭到嚴厲的懲罰。一直遲至十九世紀中期，封建制度崩解，市民要求開放，「公園」才注入「公共」的概念，成為近代都市結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中國城市的園林，也都是官員及富豪私人所有，從來不對公眾開放。所以臺灣最早的公園源於日本統治初期，起因於日本的積極西歐化。

自然在都市的摩肩擦踵的生活中，一八九九年，環抱兩萬坪綠地的臺北公園出現，因為比圓山公園晚兩年出現，故俗稱為「新公園」（現為二二八紀念公園），種植許多熱帶花木，林蔭下放置椅凳。如今公園裡的水池，當時據稱是臺灣第一個充滿西方風情的噴水池，噴水池屬於西式庭園的一部份。公園西北角是日式庭園，東北角是草地運動場，可以進行棒球、排球、田徑比賽，旁邊是網球場，西側是露天音樂臺，西南角是角力場、兒童遊戲場、咖啡館「Café Lion」，東南隅則是臺北放送局，另外還搭配圓環和噴水池做為道路的端點。¹⁰¹痴音的〈大都會〉：

公園內，風景好／手牽手，來（遊玩的臺語）！

哥哥唱歌妹同和／聲也好，韻也好，／相親相愛『乞斯』更巧好。¹⁰²

這裡的公園，指新公園。新公園的作用頗多。北端後來則蓋了臺灣總督博物館，則是休閒隨時轉換為知識的語。內部分高山族歷史、地質、礦物、動物、南洋及雜物六部分。一九〇八年創立，一九一五年竣工。總督府圖書館位在臺北市內書院町（總統府後博愛大樓），藏有四十餘萬圖書，每日有數百人閱覽，也有巡迴文庫到臺灣各地。其中，特設兒童室給兒童自學自習。¹⁰³植物園、動物園。

¹⁰¹ 蘇碩斌：〈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博士論文，2002年），頁239-240。

¹⁰² 痴音：〈大都會〉，頁11。

¹⁰³ 〈總督府圖書館〉，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

日本政府提倡運動，各種運動類型新穎，場所設備先進，如市營游泳池、臺北淡水高爾夫球場——在淡水街邊的廣大平原，汽車二十分鐘可到達，北方有海，西方有觀音山可眺望，為高爾夫球最合適之處。淡水海水浴場。

場所建設催動置身其中的人們的活動。殖民政府制訂的官定休假日，提倡餘暇生活。每逢祝祭日，學校放假，放假前一天的朝會上必定講授該節日所代表的意義。總督府有計畫向社會宣導體育、音樂、美術、電影、觀光旅行等餘暇活動，經常舉辦運動會、音樂會、展覽會、電影欣賞會……，並以市民為對象。¹⁰⁴星期六、日及例假日，公園、風景名勝地、海水浴場等常是人潮洶湧，遊客如織。「餘暇生活」漸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¹⁰⁵這種從外在俯瞰地以訂定制度，改變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習慣的方式，事實上，亦為一種看不見的、無所不在的規訓，旨在使臺灣人接受日本國民精神的。吳漫沙這樣寫道：

「各地的名勝古蹟，我們都玩過了，一時實在想不出什麼地方好？」「爸爸！我們到圓山動物園和遊園地去好麼？」「哈哈！孩子所說的都是圓山啦！新公園啦！」「阿母！圓山不是很好玩嗎？動物園裡有虎，也有美麗的孔雀，活潑的猩猩！」¹⁰⁶

以上這段描述，從名勝古蹟到新公園、動物園，寫出餘暇生活的實景，現代城市設施在餘暇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人們對生活某種炫耀式的滿意度。曉風〈新春的街頭〉的另一段描寫裡，直接了當表達了在殖民政府力圖改革的銘刻，新年裡，朋友互道「新年進步」：

「唔！老友！恭喜！恭喜！」／「恭喜！老友新年進步！」

<http://tlh.lias.nccu.edu.tw:8080/dspace/handle/las/1265>，2012年6月13日查詢。

¹⁰⁴ 吳文星：〈近代臺灣的社會變遷〉，<http://www.docin.com/p-105870447.html>，2012年6月13日查詢。

¹⁰⁵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53-62、111-155。

¹⁰⁶ 吳漫沙：〈母性之光（二）〉，《風月報》第125期（1941年3月3日），頁26。

.....

「少奶奶！上那兒去？」／「二大孀！我們上神社參拜去！」
老的少的跨上了圓山的汽車！¹⁰⁷

正是在進步的包裝下，殖民者的信仰圓山神社融入都市生活中人們餘暇時的心靈休憩所，意味著被殖民者最深層意識活動的改造完成。圓山，即圓山公園，係日治臺灣第三年就建造的第一座公園——為臺北城添置近代化的色彩。透過小說人物秀子的口中，作者介紹附近的建置：「明治橋下，從臺北市乘坐合自動車到圓山，就是明治橋，那裡有臺灣神社和一個動物園。」¹⁰⁸

追溯臺北的建城，雖然也遵循著中國傳統城市的藍圖，但長安並非它所仿擬的對象，與京都仿唐朝長安城而興建不同。臺北城為長方形石城，有五個門樓，其中北門、東門有附郭，城外有濠。根據一九〇一年伊能嘉矩調查，在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興工，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竣工。¹⁰⁹臺北城依風水而規畫，西城牆與東城牆的方位均對準七星山，¹¹⁰這多少含「因時制宜」的意味。然而日治臺灣以後，開始以京都為範本繼續規劃臺北城。今日臺北四周環山的地景一似京都，舊城區有如皇居，而劍潭山（一說為草山，即今日的陽明山）略如京都北山，以故臺北神社即建立於劍潭山上，劍潭古寺遷移到大直（今實踐大學旁）。在中正區／榮町之外，圓山區也因為它的地理位置，而有了不同機能的區域性發展，明治橋、圓山公園、動物園、臺灣神社等形成名勝風景區塊，成為休假日市民訪遊的所在。¹¹¹恨我筆下那位情場失意的男子，則是「不論晴天陰天，他都是獨自蹣跚地走在圓山明治橋一帶。」¹¹²

¹⁰⁷ 曉風：〈新春的街頭〉，《風月報》第100期（1940年1月1日），頁15。

¹⁰⁸ 吳漫沙：〈黎明了東亞〉，《南方》第138期（1941年9月15日），頁27。

¹⁰⁹ 轉引自林初乾：〈《台灣文化事典》編纂與出版誌言〉，《師大校友》第326期，頁20，<http://www.ntnu.edu.tw/alumni/alumni-07/326/10-23.pdf>，2012年6月13日查詢。

¹¹⁰ 「臺北建城一百二十週年圖像展」，<http://dava.ncl.edu.tw/voddata/web-taipeicity/preface/preface.htm>，2012年3月14日查詢。

¹¹¹ 不僅僅是一般民眾利用閒暇之餘去圓山公園休憩遊玩，圓山公園的山光水色亦常常吸引傳統漢文人慕名而來，李逸濤有詩云：「滾滾波間白雪堆，圓山亭子逐江開。十千兒得淵明酒，遙憶伊人懶舉杯。」，《臺灣日日新報》第1版，1900年11月21日。

¹¹² 恨我：〈明治橋上〉，《風月報》第116期（1940年9月1日），頁10。

誠如卡爾維諾的觀察，「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棋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¹¹³在城市這一個層面，出現許多互相扶持與傾軋的力量。一切歷史的、曾經被時間界定的事物，道路、路牌、社區，以及廣場、公園、銅像，所有的造形，以及往來的個人或群眾，單獨或群聚的活動，是並時的、多重編碼的，都在這奇異的空間中流動、凝定，呈現、變形，或和平共存，或衝撞歧義。因而，如鄭明嫻〈知性的建築——關於「都市散文」〉¹¹⁴所說，都市永遠不會僅限於表層意義，它還被充實了隱藏於背後的象徵意義。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都市因各種不同力量的衝激而不停的處於變遷狀態的情境。

四、結論

當城市社區僅佔社會的一小部分時，尚不足以發生顯著的社會變遷。但當城市社區的範圍擴大，工業、商業、服務業越來越發達，其重要性凌駕農業之上，社會生活勢必產生很劇烈的變化：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鄉村社會轉變成城市社會，¹¹⁵禮俗社會轉變成市民社會。這還止於城市形態的影響層面，更進一步，我們不妨深入其緣由。傳統、農業、鄉村、禮俗社會，基本上以宗姓血緣、以地緣籍地與其延續關係下的人群做為社會體的主要組織方式，展開商業的行郊、農業的聚落、寺廟的信仰等等組織與合作。而其負向的展現，則為分類械鬥，宗姓、籍地、信仰的基礎，轉而成為向外爭為資源的爭奪或相處的磨擦，群聚打架。要到資本主義發展後，才開始趨向直接利害關係的利益團體的動員。日治時期，城市社區以看得見的建築，看不見的權力，將臺北城建構為知識／金錢，政治金融／教育休閒的現代化城市，並不斷擴大其城市社區的規模，完成城市性格的轉變。就身世而言，具備其他許多城市所沒有的特殊性。

本文以臺北為城市文本，進行閱讀。臺北，也就是這麼一個符旨不斷在加入，

¹¹³ 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 著，王志宏譯：《看不見的城市》，頁 20。

¹¹⁴ 鄭明嫻：〈知性的建築——關於「都市散文」〉，《浪跡都市——臺灣都市散文選》（臺北：業強，1990 年），頁 3-15。

¹¹⁵ 汪民安等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頁 497。

符徵不斷與時俱變的一座身世複雜的城。從臺北市的市區改正、住屋興革始論，接著，我們在街市中漫遊，一一辨認出地標、節點、邊界，如火車站、總督府、郵局、銀行、百貨公司、公園、神社等，串連都市空間與活動的社會意義，分別從交通、經濟、教育加以觀察，我們儼然在閱讀一篇城市散文或小說。¹¹⁶而呂赫若、龍瑛琮、朱點人、吳漫沙、恨我、王詩琅等作家針對都市文本閱讀而生產出來的散文或小說，成就我們另一層次對都市文本的閱讀。兩者參差對照，正好凸顯都市空間、城市規劃者與住民活動彼此關聯的多層次與複義性。圖片、記錄與作家書寫為我們留下在臺北市的創新與壞毀，因而造成的社會變遷，以及生活中的人們的肆應態度與實際行動，至今仍充滿啟發性。

¹¹⁶ 此地若干話語借用王志弘：〈城市的身世〉，《聯合文學》第10卷第5期（1994年3月），頁40-45。

引用文獻

- 「大稻埕主題館」, <http://proj1.sinica.edu.tw/~photo/subject/D-4-GIS/index.html>, 2012 年 6 月 12 日查詢。
- 中原大學建築系:〈第二章 都市發展歷程下的日式住宅分布〉, 台北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 <http://web.bp.ntu.edu.tw/bpresults/jhouse/index1.htm>, 2012 年 6 月 13 日查詢。
- 〈日本統治前期【三、殖民經濟的奠定】〉, 認識臺灣, <http://192.192.159.187/9taiwan/taiwan1.htm>, 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 〈日治時期臺北郵便局落成紀念〉, 原載於《府城郵友會刊》37 期「秋季刊」, <http://blog.sina.com.tw/stampinged/article.php?pbgid=1324&entryid=3869&comopen=1>, 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 王志弘:〈城市的身世〉,《聯合文學》第 10 卷第 5 期, 1994 年 3 月, 頁 40-45。
- :〈都市流動危機的論述與現實——臺北「交通黑暗期」的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 期, 1991 年 12 月, 頁 105-182。
-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 臺北:聯經, 1999 年。
- 王驥懋:〈生產者服務業在信義計畫區的發展——以不動產開發機制為例〉,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年。
- 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著, 王志宏譯:《看不見的城市》, 臺北:時報文化, 1993 年。
-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 張旭東譯:〈歷史哲學論綱〉,《思與文》,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ttg/benyaming/005984.htm>, 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 向陽主編:《二十世紀臺灣文學金典:小說(日治時期)》, 臺北:聯合文學, 2006 年。
-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臺北:印刻, 2002 年。
- 〈污物取締規則〉,《臺灣日日新報》第 2 版, 1900 年 4 月 21 日。
- 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 劉北城、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 年。
- 江寶釵、謝崇耀:〈從瀛社活動場所觀察日治時期臺灣詩社區的形成與時代意義〉,

《中國學術年刊》第 32 期，2010 年 3 月，頁 209-256。

何培齊編纂：《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國家圖書館，2007 年。

吳文星：〈近代臺灣的社會變遷〉，<http://www.docin.com/p-105870447.html>，2012 年 6 月 13 日查詢。

——：《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 年。

吳漫沙：〈母性之光（二）〉，《風月報》第 125 期，1941 年 3 月 3 日，頁 26-28。

——：〈黎明了東亞〉，《南方》第 138 期，1941 年 9 月 15 日，頁 24-27。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年。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06 年。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17 卷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217-254。

——：〈明清消費社會與物質文化的研究回顧與展望〉，

<http://www.mh.sinica.edu.tw/eng/download/abstract/abstract7-2.pdf>，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李永熾：〈谷崎、川端與一九二〇年代的淺草〉，《當代》第 38 期，1989 年 6 月，頁 46。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2008 年。

李逸濤：〈佚名〉，《臺灣日日新報》第 1 版，1900 年 11 月 21 日。

卓克華：〈艋舺行郊初探〉，《臺灣文獻》第 29 卷第 1 期，1978 年 3 月，頁 188-192。

——：〈臺灣行郊之組織功能及貢獻〉，《臺北文獻》直字第 71 期，1985 年 3 月，頁 55-112。

周志龍：《全球化、臺灣國土再結構與制度》，臺北：詹氏書局，2003 年。

林昶乾：〈《台灣文化事典》編纂與出版誌言〉，《師大校友》第 326 期，頁 20，

<http://www.ntnu.edu.tw/alumni/alumni-07/326/10-23.pdf>，2012 年 6 月 13 日查詢。

林耀德主編：《浪跡都市——臺灣都市散文選》，臺北：業強，1990 年。

邱澎生：〈試論清代臺灣工商社團權力發展的特質〉，

<http://www.sinica.edu.tw/~pengshan/Taiwanmerchantassociation.htm>，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城現輝煌建城一百二十週年圖像展〉，臺灣記憶，

<http://dava.ncl.edu.tw/voddata/web-taieicity/north/north.htm>，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 恨我：〈明治橋上〉，《風月報》第 116 期，1940 年 9 月 1 日，頁 10-11。
- 施淑編：《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
- 柏格森（H. Bergson）著，張君譯：《物質與記憶》，臺北：先知，1976 年。
- 范姜松伶：〈「公共」的變遷：以清治、日治初期台北的街道觀點為例〉，《文化研究月報》第 57 期，2006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7/journal_park437.htm，2012 年 6 月 13 日查詢。
- 茅盾：《茅盾全集：補遺》，北京：人民文學，2006 年。
-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臺北：麥田，2010 年。
- 〈除污規程〉，《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1902 年 3 月 9 日。
- 高鼎翔：〈日治時期臺鐵官舍建築平面構成之探討〉，臺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 張君豪：〈菊元百貨〉，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7607>，2012 年 6 月 13 日查詢。
- 張東天：〈作家與都市認識——以老舍的〈四世同堂〉和朴泰遠的〈川邊風景〉為主〉，地點：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7 年 3 月 28 日。
- 張恆豪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臺北：前衛，1991 年。
- 張鴻雁：〈城市空間的社會與「城市文化資本」論——城市公共空間市民屬性研究〉，《城市問題》第 5 期，2005 年，頁 2-8。
- 曹潛：《中華郵政史·臺灣編》，臺北：交通部郵政總局，1981 年。
- 莊永明：《臺灣世紀回味：生活長巷》，臺北：遠流，2001 年。
- 許雪姬：《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洋務運動與建省》，臺北：自立晚報，1993 年。
- ：〈臺灣銀行〉，《臺灣歷史辭典》，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14/cca220003-li-wpkbhisdict003941-1159-u.xml>，2012 年 3 月 14 日查詢。
- 陳允元：〈島都與帝都：二、三〇年代臺灣小說的都市圖象（1922-1937）〉，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 陳世慶：〈水晶處女（十三）〉，《風月報》第 104 期，1940 年 3 月 4 日，頁 10。
- 陳芳明：《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2007 年。
- 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2005 年。

陳家瑄：〈文字圖像經驗下的臺北市庶民生活〉，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8年。

陳盛韶：《問俗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1979年。

傅朝卿：《日治時期臺灣建築（1895-1945）》，臺北：大地地理，1999年。

黃千珊：〈日治時期旅人的城市經驗——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為觀察核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黃秀政、吳文星、張勝彥等人著：《台灣史》，臺北：五南，2011年。

黃啓明：〈艋舺與龍山寺〉，《臺北文物》第2卷第1期，1953年，頁47-49。

黃得峰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郵政史料彙編（明治二十八年至明治三十二年）》，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年。

黃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1895-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熊月之、張生：〈中國城市史研究綜述（1986-2006）〉，《史林》第1期，2008年，
http://www.sino-eh.com/sts/ThesesHTML/Thesis_557.shtml，2012年6月12日查詢。

「臺北建城一百二十週年圖像展」，

<http://dava.ncl.edu.tw/voddata/web-taipeicity/preface/preface.htm>，2012年3月14日查詢。

〈臺北風華錄〉，http://memory.ncl.edu.tw/tm_new/subject/taipei/taipei01a.htm，2012年3月14日查詢。

艋舺龍山寺志編纂委員會編：《艋舺龍山寺全志》，臺北：艋舺龍山寺志編纂委員會，1951年。

〈臺灣教育令〉，《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9年1月8日。

〈臺灣教育令公布〉，《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22年2月8日。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編：《遞信志·氣象編》，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26年。

：《遞信志·航路標識編》，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28年。

：《遞信志·通信編》，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28年。

裴在美：《海在沙漠的彼端》，臺北：九歌，1998年。

劉芳瑜，〈施九緞事件〉，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521>，2012年6月12日查詢。

蔡秀枝：〈城市文本與空間閱讀〉，《文化研究月報》5期，2001年7月，

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2.htm，2012年3月14日查詢。

曉風：〈大馬路和小馬路〉，《風月報》第132期，1941年6月15日，頁8。

——：〈除夕之夜〉，《風月報》124期，1941年2月15日，頁17-18。

——：〈新春的街頭〉，《風月報》第100期，1940年1月1日，頁15。

〈總督府圖書館〉，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

<http://tlh.lias.nccu.edu.tw:8080/dspace/handle/lia/1265>，2012年6月13日查詢。

薛琴主持：《臺北市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報告書·第二章》，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2000年，頁6-33。

http://twinfo.ncl.edu.tw/cgi/local/index_list?id=00000636，2012年3月14日查詢。

薛琴演講、撰稿：「日式宿舍與老樹」（臺北「齊東街」日式宿舍群與老樹故事），「從古蹟看臺北」系列講座，2003年6月26日（四）。

<http://blog.xuite.net/blueful/note/3815559>，2012年3月14日查詢。

蘇碩斌：〈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博士論文，2002年。

——：《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與權力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年。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中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年。

新道滿編：《臺灣市街庄名の読み方》，臺北：藤井秀夫，1938年。

藤井恭敬著：《臺灣郵政史》，臺北：成文，2010年。

Ting：〈臺灣省專賣局〉，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6462>，2012年6月13日查詢。

Taipei Urban Colonial Modernity: Some Observations Based on the Design of Roads and Buildings

Chiang Bao-ch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engaged in city planning, changing Taipei's infrastructure by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roads and buildings. Thus the city became a functional form of education. How did Taiwanese respond to this? Mere acceptance, or was there any form of resistance? How did this activity change people's lives? How has it left tracks in the city or in literature?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Colonial modernity, City, Taipei, City planning, New buildi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